

# 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比较的链式中介模型

■ 赵丹丹 张良驹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4;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摘要】**近年来,人口增长放缓与生育率持续走低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青年群体生育意愿普遍偏低,已成为影响国家整体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本文引入相对剥夺感理论,构建“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社会心态—生育意愿”的链式传导模型,探究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研究表明,社会比较越强烈,青年个体感受到的相对剥夺感就越高,而这种剥夺感会进一步负向影响社会心态,导致青年个体的社会心态愈加消极。社会心态的消极化会抑制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而社会心态越积极,青年生育意愿则越高。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时代青年低生育意愿背后的心理逻辑,为拓展政府生育支持政策的干预维度、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启示。

**【关键词】**青年生育 生育意愿 社会比较理论 相对剥夺感理论

## 一、问题提出

在人口发展战略与中国式现代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生育政策优化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命题。近年来,从“全面二孩”到“三孩政策”的制度演进,从延长产假到生育津贴的配套支持,我国政府构建了多维度的生育友好型政策体系,并在全社会范围内着力营造鼓励生育的文化氛围。然而颇具悖论的是,青年群体却呈现出显著的生育意愿低迷现象,有的青年甚至表现出对生育行为的排斥心理。这种生育政策投入与效果产出的显著失衡,不仅消解着

收稿日期:2025-03-06

作者简介:赵丹丹,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和青年人口问题;  
张良驹,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青年学、青年发展和青年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青少年网络舆情的大数据预警体系与引导机制研究”(课题编号:208ZD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对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下推进现代化进程构成现实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sup>[1]</sup>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既创造了支撑超大规模经济体发展的人口红利,也意味着生育率持续走低将直接冲击人口规模优势的可持续性。

在传统经济成本、职业发展等显性生育影响因素之外,数字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机制正在重塑青年的生育认知图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sup>[2]</sup>。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其深度沉浸的媒介化生存状态,使其长期暴露于高度选择性的信息环境之中。社交平台上,某些商家精心构建的完美“生育—育儿”景观,即私立医院标价六位数的“明星分娩套餐”、月子中心以奢侈品为对标的高端护理服务、网红家庭展示的婴儿万元定制包被、某些中产阶层晒出的百万精英教育账单,形成覆盖生育全周期的消费主义符号体系。这种媒介化的家庭生育叙事,通过将“从孕期到学龄”的每个环节商品化,建构起“生育标杆”的虚拟坐标系,促使青年在无意识中启动持续性的向上社会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当个体以社交媒体中经由算法筛选的“理想化生育图景”为参照时,媒介内容的选择性呈现与认知锚定效应共同作用,导致其对自身资源的评估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在生育成本显性化(如高端产护服务)与育儿标准精致化(如精英教育范式)的双重压力下,持续强化青年现实和理想的感知差距,最终触发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负面情绪体验。

既有研究从多个维度揭示了数字时代社交媒体与生育意愿的关联性,如社交媒体通过风险感知强化与信息交互去中心化显著抑制生育意愿<sup>[3]</sup>,互联网使用通过机会成本递增与观念代际断裂双重路径降低生育意愿<sup>[4]</sup>,网络媒介的价值偏好重构削弱家庭主义生育动机<sup>[5]</sup>,以及青年生育信息追随行为中消极叙事的认知框架产生形塑作用<sup>[6]</sup>,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数字时代青年生育意愿的变迁提供了重要视角。然而,关于数字时代的媒介接触如何转化为生育决策的心理机制仍缺乏系统性的阐释,尤其是社会比较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如何通过社会心态传导并抑制青年生育意愿的链式过程尚未得到充分阐明。基于此,本研究引入社会比较理论和相对剥夺感理论框架,构建了“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社会心态—生育意愿”的链式传导模型,旨在揭示数字时代青年生育意愿的心理机制,并为政策优化提供新视角。

##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 (一)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与社会心态

社会比较理论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莱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于1954年提出,该理论认为个体天生具有评估自己的驱动力,通常是通过与他人进行比较来实现这一点。个体对自己做出各种判断,而社会比较,即通过与他人进行对比来分析自我,是其中一种重要

方式。费斯廷格认为,个体之所以进行这种比较,是为了建立一个基准,从而能够对自己做出准确的评估<sup>[7]</sup>。社会比较过程涉及个体通过将自己的态度、能力和特征与他人进行比较来认识自己。社会比较有两种类型,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向上比较发生在个体将自己与认为比自己更优秀或更出色的人进行比较时。这种比较通常侧重于提升自我、改善现状或提高能力。个体可能会将自己与更为成功的人进行比较,寻找能够实现类似结果的途径。向下比较则是个体将自己与那些比自己更糟糕的人进行比较。这种比较通常是让自己感觉更好,即个体可能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但至少比某些人更为优秀。当个体希望从他人身上汲取激励时,会与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进行比较;而当个体希望通过对比让自己感觉更好时,则会选择与比自己更差的人进行比较<sup>[8]</sup>。社会比较不仅在个体对自己进行评判时发挥作用,还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当个体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常会因他人展现出的完美形象而影响其自信心、动机和态度,社会比较过程中形成的认知落差与负面情绪,构成了相对剥夺感形成的心理机制。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RD)是指个体通过与特定参照标准进行主观比较后,认定自身处于劣势地位,并由此引发愤怒与怨恨情绪的心理状态<sup>[9]</sup>。格尔(Gurr)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价值期望和价值实现之间的一种感知性差异<sup>[10]</sup>。朗西曼(Runciman)指出,相对剥夺感作为比较后的主观感知,其产生需要以下4个条件:(1)A没有X;(2)A看到某些其他人(可能包括他在过去某个时间或预期时间内的自己)拥有X(无论事实上是否如此或将来是否会如此);(3)A渴望X;(4)A认为自己拥有X的期望是合理可行的。需要强调的是,相对剥夺感本质是主观认知的失衡,与客观资源匮乏无必然关联,其强度取决于个体对参照群体的感知差距<sup>[11]</sup>。这种个体层面的剥夺感知通过群体传播和互动不断累积,可能引发集体层面的情绪共鸣,进而形成广泛的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指在特定社会运行状态或重大社会变迁过程中,广泛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中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图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sup>[12]</sup>。杨宜音认为,社会心态可以被理解为“万众一心”“众心之心”,是个体通过社会认同、情绪感染与去个性化等机制相互建构的动态产物,最终形成超越个体简单总和的宏观心理现象,其本质反映个人与社会互构的复杂关系<sup>[13]</sup>。当人们通过社会比较感知到自身处境与参照群体的差距时,可能触发个体的相对剥夺感,这种心理落差在群体互动中经由情绪感染与社会认同的强化,可能逐渐沉淀为反映集体利益失衡感知的宏观社会心态。

基于以上讨论提出下列假设:

H1:社会比较正向影响相对剥夺感。

H2:相对剥夺感负向影响社会心态。

## (二)社会比较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生育意愿作为个体生育观念的外显表达,既是预测生育行为的关键变量,也是理解人口生育水平变动的重要维度。学界普遍认为,生育意愿的形成始于生育上的愿望和追求,并通过对生育子女的目的、数量、性别及素质的期望得以具体化<sup>[14]</sup>。生育意愿是“人们对生育行

为的最佳设计”<sup>[15]</sup>,既包含个体对理想家庭结构的构想,也暗含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动态回应。例如,谭克俭指出,生育意愿作为生育行为的“动力源泉”,直接受生育观支配,并通过生育时间、数量等维度形成可观测的心理倾向<sup>[16]</sup>;杨瑛、武俊青团队进一步将生育意愿操作化为“理想子女数与子女性别”的测量框架,揭示了其与生育行为的复杂关联<sup>[17]</sup>。这些定义虽侧重不同,但核心逻辑高度一致,生育意愿既是个人生命规划的微观镜像,也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宏观投射<sup>[18]</sup>。随着社会转型加速,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逐渐显现出新特点:初育年龄推迟,生育决策更关注质量而非数量,传统家庭责任与个体发展需求的冲突日益凸显。从内在结构看,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形成既包含对住房、教育成本的现实考量,也涉及青年群体对社会生育支持系统的信任度(如生育支持政策的落地效果、性别公平性感知),还与青年个体对生育行为与自我价值实现的关系认知密切相关。低生育率时代人口生育的核心问题是“未意愿的怀孕”<sup>[19]</sup>。

生育意愿的波动既受个体心理特征影响,也与外部环境紧密关联。在职业前景不稳定、风险敏感度提高的个体层面,叠加生育支持政策效果有限、代际互助模式转变等现实因素,社会比较机制对青年群体生育决策的影响愈发显著。青年主动压缩生育计划的现象,实质上是外部压力与个体能动性博弈的结果。当青年群体在向上比较中察觉到自身与高资源群体在教育机会、经济保障等层面的差异,相对剥夺感则可能在反复对比中逐渐增强。这种心理落差通过社交媒体中的情绪共鸣和符号化表达,最终形成内卷化育儿的群体认知。当追赶无望成为青年群体普遍的心理状态时,生育选择往往倾向于规避风险,表现出个体理性考量与集体困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基于以上讨论提出以下假设:

H3:社会比较负向影响青年生育意愿。

### (三)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的链式中介效应

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在社会比较中感受到的不足和不公平,这种感受通常伴随着愤怒、怨恨与挫败感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不仅影响个体的情感状态,还会对其认知产生负面影响,包括降低自我效能感、引发焦虑等。当个体未能有效控制负面情绪时,可能会导致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出现不平衡。社会比较是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前因。在当今数字技术和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社会比较现象愈发明显。社交平台的普及使得青年更容易接触到他人的生活和成就,进而引发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比较。随着社会比较的加剧,个体可能会感受到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感受会在心理上造成负担。尤其是在生育问题上,许多青年将生育行为视为加剧自身社会资源竞争的风险源,他们会因感到生活成本高、性别不平等、工作压力大等因素对生育产生顾虑,进而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因此,随着社会比较的加剧,相对剥夺感随之上升,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也会变得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心态的波动上,更表现为青年对社会现状的思考和对其未来的不确定感。这种思考使青年在面对生育问题时,可能产生更多的顾虑,从而影响他们的生育意愿。

基于以上讨论提出下列假设：

H4:相对剥夺感在社会比较与青年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5:社会心态在社会比较与青年生育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

H6: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在社会比较与青年生育意愿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青年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社会比较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及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在两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假设模型见图1),从而为应对青年低生育意愿现状提供新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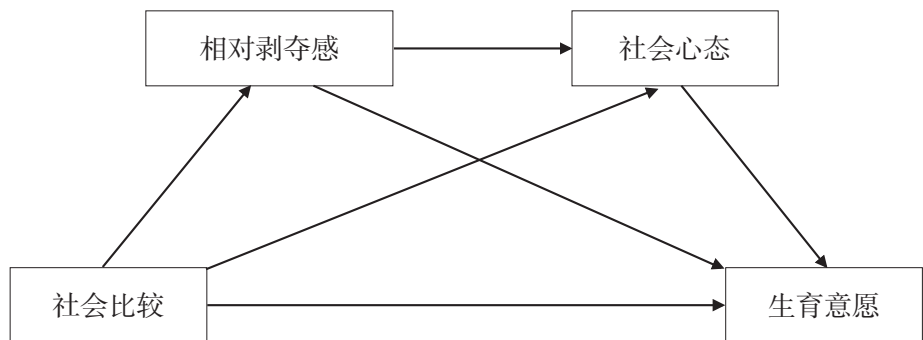


图1 假设模型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收集

本次调查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相关课题安排,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电子问卷形式进行发放。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进行了小规模的测试,以便及时调整和完善问卷题项。出于两个方面考虑,本次调查选定处于20-35周岁的青年作为被调对象:一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范围划定为14-35周岁<sup>[20]</sup>;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未对公民生育年龄设置强制性规范,但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条,在结婚年龄方面,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sup>[21]</sup>。合法的生育应当在双方达到结婚年龄进行结婚登记成为合法夫妻后进行,据此,本次调研对象的年龄划定在20-35周岁。

为提升样本对全国20-35周岁青年群体的代表性并尽可能降低选择偏差,本次调研严格遵循目的性抽样原则,采用了复合抽样策略。在具体实施中,抽样范围覆盖华北、华东、东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七大区域,并纳入了高中(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等不同教育程度的群体。此外,本次抽样依据最大化差异原则选取了具有高度异质性的初始种子样本,确保其在地域分布、受教育水平以及婚育状况等关键维度上呈现广

泛差异,部分初始种子来源于不同地区的高校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员及个体工商户从业者等。在多样的初始样本基础上,本研究结合使用了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方法,以期触及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本研究充分认识到,滚雪球抽样方法依赖参与者社交网络的特性,可能导致样本集中于特定的社交圈层,如基于相似教育背景、地域或兴趣形成的群体,存在潜在的选择偏差风险。这种偏差可能限制样本对目标青年总体的代表性,并进而影响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为尽可能缓解这一局限并扩大样本多样性,初始种子的选取特别强调了来源的广泛性和特征的异质性。本次调查共收集问卷样本 740 份,其中有效样本 645 份,有效回收率为 87.16%。样本数据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从性别来看,男性占 45.9%,女性占 54.1%;年龄上,20-25 岁(包括 20 岁)占比 40.6%、25-30 岁(包括 25 岁)占比 46.4%、30-36 岁(包括 30 岁)占比 13%;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高中(中专)及以下占比 4.3%、大专占比 22.9%、本科占比 31.5%、硕士占比 29.8%、博士占比 11.5%;从意愿子女数看,不希望有孩子占比 27.2%、希望有一个孩子占比 43.7%、希望有两个孩子占比 22.3%、希望有三个孩子及以上占比 6.8%。

## (二)变量测量

为保证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借鉴了国内外成熟量表,并根据研究内容对成熟量表进行适应性调整。各题项均采用 Likert 五点量表计分,数值 1 表示强烈反对的态度“非常不同意”“非常不符合”,2 表示“不同意”“较小程度上”,3 表示“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一般”,4 表示“同意”“较大程度上”,5 强调有利的态度“非常同意”“非常符合”。对于负面内容题项,最后指定的数值会被反转处理,以确保结果一致。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 SC)借鉴吉本斯(Gibbons)和布恩克(Buunk)开发的社会比较倾向量表,该量表将社会比较划分为能力社会比较和观念社会比较两个维度,以分别测量个体在能力、观念方面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的可能性与意愿性<sup>[22]</sup>。

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 RD)采用马皑编制的相对剥夺感量表,该量表测量个体与特定参照群体比较时形成的一种对两者之间差异的主观感受<sup>[23]</sup>。

社会心态(Social Mentality, SM)借鉴布拉西尼(Brasini)等开发的社会心态量表。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强调了“最近四周内”的感受。社会心态量表是一种旨在评估由基本人际动机系统产生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模式的自我报告问卷,包含 6 个维度:不安全感、亲社会性、竞争性、归属感、性倾向、游戏性<sup>[24]</sup>。这 6 个维度共同刻画了青年生育意愿所依托的社会心理背景,并间接影响生育意愿的形成过程:不安全感影响个体承担生育责任的意愿;亲社会性体现家庭纽带重视度与情感付出倾向;竞争性涉及资源分配压力与社会比较感知;归属感与生育的社会规范压力和群体认同相关;性倾向构成亲密关系的潜在基础;游戏性则反映积极灵活应对挑战的能力。

生育意愿(Fertility Desire, FD)借鉴周国红等<sup>[25]</sup>和张良驯等<sup>[26]</sup>编制的青年生育意愿量表,结合政策关注度、话题讨论倾向性、代际支持态度、生育价值认知及具体生育计划五个维度构建测量框架。

## 四、实证分析

###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使用 SPSS23.0 和 AMOS23.0 对数据整理分析。关于信度,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社会心态、生育意愿四个量表和总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 0.914、0.907、0.708、0.929、0.930,问卷信度较好。关于效度,本文量表借鉴国内外成熟量表,具有良好内容效度。此外,量表的 KMO 值为 0.935,相应的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p$  值小于 0.000,具有较好结构效度。最后,通过 AMOS23.0 进行拟合度检验,模型适配指标  $=3.681 < 5$ ,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0.065 < 0.08$ ,拟合优度指数  $GFI=0.882 > 0.8$ ,该模型各项参数指标符合检验标准,模型拟合度较好,具有良好区分效度。

###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受客观条件限制,自评方式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数据收集完毕后,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验。一方面,向受访者承诺保护其匿名性,调查仅用于学术研究以尽量减少受访者的顾虑。同时,设置反向题项,以防止受访者习惯性评分,如都评低分或高分导致的题项间异常高相关。另一方面,采用 Hraman's Single - Factor Test 单因素检验,将所有项目加载到探索性因素中分析并检查未旋转的因子结构。结果表明,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 38.018%,低于 50%的临界值,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 (三)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利用 Pearson 系数分析变量间相关性,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见表 1。结果显示,社会比较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剥夺感( $\beta=0.667, p < 0.001$ )、社会心态( $\beta=0.329, p < 0.001$ )和生育意愿( $\beta=0.467, p < 0.001$ )。同时,社会心态显著正向影响青年生育意愿( $\beta=0.622, p < 0.001$ )。此外,实际子女数和相对剥夺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社会心态存在显著负相关,与生育意愿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各变量间显著性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初步支持,符合进一步对社会比较与生育意愿关系做中介效应检验的统计学要求。

表 1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n=645)

| 变量    | M $\pm$ SD        | 实际子女数    | 社会比较     | 相对剥夺感    | 社会心态     |
|-------|-------------------|----------|----------|----------|----------|
| 实际子女数 | 0.259 $\pm$ 0.635 | —        | —        | —        | —        |
| 社会比较  | 3.209 $\pm$ 0.952 | - 0.042  | —        | —        | —        |
| 相对剥夺感 | 2.676 $\pm$ 1.051 | 0.103**  | 0.667*** | —        | —        |
| 社会心态  | 2.931 $\pm$ 0.726 | - 0.095* | 0.329*** | 0.105**  | —        |
| 生育意愿  | 2.748 $\pm$ 0.937 | 0.043    | 0.467*** | 0.301*** | 0.622*** |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下同。

#### (四)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使用PROCESS3.4 Model6执行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将受访者的社会比较作为自变量,生育意愿为因变量,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为中介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表2结果显示,社会比较显著正向预测青年生育意愿( $\beta = 0.467, p < 0.001$ ),且社会比较分别对相对剥夺感( $\beta = 0.667, p < 0.001$ )和社会心态( $\beta = 0.466, p < 0.001$ )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相对剥夺感显著负向预测社会心态( $\beta = -0.206, p < 0.001$ );当把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时,社会比较( $\beta = 0.230, p < 0.001$ )、相对剥夺感( $\beta = 0.092, p < 0.05$ )和社会心态( $\beta = 0.537, p < 0.001$ )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年生育意愿。

表2 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 <sup>2</sup> | F          | $\beta$ | t         |
|-------|-------|-------|----------------|------------|---------|-----------|
| 生育意愿  |       | 0.467 | 0.218          | 179.664*** |         |           |
|       | 社会比较  |       |                |            | 0.467   | 13.404*** |
| 相对剥夺感 |       | 0.667 | 0.445          | 515.233*** |         |           |
|       | 社会比较  |       |                |            | 0.667   | 22.699*** |
| 社会心态  |       | 0.363 | 0.132          | 48.645***  |         |           |
|       | 社会比较  |       |                |            | 0.466   | 9.444***  |
|       | 相对剥夺感 |       |                |            | -0.206  | -4.179*** |
| 生育意愿  |       | 0.685 | 0.469          | 188.495*** |         |           |
|       | 社会比较  |       |                |            | 0.230   | 5.573***  |
|       | 相对剥夺感 |       |                |            | 0.092   | 2.341*    |
|       | 社会心态  |       |                |            | 0.537   | 17.371*** |

进一步对中介路径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和图2所示,社会比较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直接效应显著,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在社会比较与生育意愿之间的总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含0值,即总中介效应显著。社会比较主要通过以下3条中介路径来影响青年生育意愿:(1)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生育意愿(95%CI=[0.001,0.122]),该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含0值,即路径中介效应显著,这表明假设H4得到验证;(2)社会比较→社会心态→生育意愿(95%CI=[0.191,0.304]),该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含0值,即路径中介效应显著,这表明假设H5得到验证;(3)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社会心态→生育意愿(95%CI=[-0.119,-0.029]),该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含0值,即路径中介效应显著,这表明假设H6得到验证。可见,社会比较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表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效应    | 路径                   | 效应值    | BootSE | Bootstrap95%CI |        | 效果量(%) |
|-------|----------------------|--------|--------|----------------|--------|--------|
|       |                      |        |        | 下限             | 上限     |        |
| 直接效应  | 社会比较→生育意愿            | 0.226  | 0.041  | 0.147          | 0.306  | 49.130 |
| 中介效应  | 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生育意愿      | 0.061  | 0.031  | 0.001          | 0.122  | 13.261 |
|       | 社会比较→社会心态→生育意愿       | 0.246  | 0.029  | 0.191          | 0.304  | 53.478 |
|       | 社会比较→相对剥夺感→社会心态→生育意愿 | -0.073 | 0.023  | -0.119         | -0.029 | 15.870 |
| 总中介效应 |                      | 0.234  | 0.046  | 0.144          | 0.324  | 50.870 |
| 总效应   |                      | 0.460  | 0.034  | 0.393          | 0.528  | 1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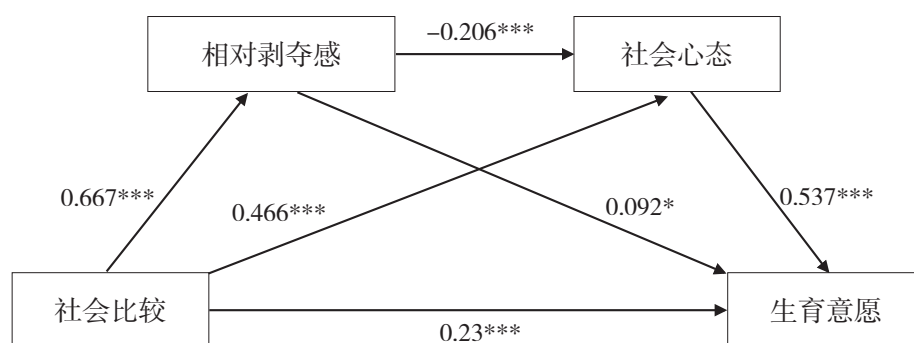


图2 链式中介效应模型

##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一）研究结论

在本研究中,直接路径表明,社会比较对青年生育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可能源于社会比较所激发的上进心与示范效应,促使青年群体将生育视为实现自身价值与承担社会责任的途径之一。链式中介路径则揭示了其中更为复杂的作用机制,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在社会比较和生育意愿之间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社会比较首先作用于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社会心态,最终对青年生育意愿产生影响。这一过程反映了社会环境因素与个体心理认知在青年生育决策中的综合作用。

第一,社会比较正向影响相对剥夺感。社会比较指向相对剥夺感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667,表示社会比较同相对剥夺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当社会比较每增加一个单位,则青年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会增加66.7%。在现实生活中,青年常常会不自觉地进行社会比较。例如,

当他们看到同龄人在高薪行业获得成功时,或是目睹他人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时,可能会不自觉地感受到一种自己不如别人的感觉。这种比较不仅限于职业成就,社交媒体的普及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许多年轻人通过社交平台接触到精英生活的展示,比如奢华的月子中心和高消费的育儿方式,这些使得部分青年对自身条件产生怀疑,认为自己无法承担生育的重任,从而降低生育意愿。社会比较不仅使青年在面对生育决策时,常会陷入“我能否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的思考中,甚至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数字时代,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和可见性偏差使得这些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更为突出,导致青年用户在无形中产生了更强烈的比较心理,这种比较一旦让他们觉得自己处于劣势,相对剥夺感就会增强。

第二,相对剥夺感负向影响社会心态。相对剥夺感在这一机制中表现出一种看似矛盾的双重角色。在初步的相关分析层面,相对剥夺感与社会心态呈现显著正相关,即在未考虑其他变量的孤立状态下,相对剥夺感可能与积极社会心态相关联。这可能反映某些青年群体将感知到的相对劣势转化为一种激励或警醒,由此产生更强的社会融入意愿或改变现状的动力。在链式中介模型层面,当引入社会比较变量后,社会比较显著正向影响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显著负向影响社会心态。可见,在引入社会比较后的路径中,相对剥夺感的作用发生重要反转,它不再是孤立状态下与积极心态相伴的关联因素,而是转变为社会比较影响社会心态的一个关键负向中介,即社会比较通过提升相对剥夺感损害社会心态。具体来看,相对剥夺感指向社会心态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06$ ,表示相对剥夺感同社会心态有显著的负相关,当相对剥夺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则社会心态会下降 $20.6\%$ 。这表明,当青年的相对剥夺感增加,比如觉得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使得自己受益少的时候,就容易产生消极的社会心态,对社会的满意度可能也会降低。有学者研究显示,高相对剥夺感的青年群体对社会公平及其施政的满意度显著降低,他们认为自身在社会层次中处在较低地位,这种相对剥夺感不仅会加剧青年的不平等感,甚至可能造成仇恨的负面心理<sup>[27]</sup>。在社交媒体上,年轻人频繁接触到与自己平凡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理想生活展示,如自由的旅行、奢侈的消费或成功的职业,这些内容极易引发他们的被剥夺感。当他们看到同龄人享受高档消费、旅游或资源时,便会感到自身在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相对剥夺感不仅限于个体层面,还可能通过情绪传染和群体极化的机制扩散到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负面情绪往往会在社交网络中迅速传播,非理性情绪极易引致观点“传染”,从而形成集体的悲观预期和消极的社会心态<sup>[28]</sup>。此外,个体在面对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时,往往会降低其对社会信任度。这种现象不仅影响青年个体的生育观念,降低青年生育意愿,也对社会生育氛围和生育利好政策的宣传和落实产生消极影响。

第三,社会心态正向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社会心态指向生育意愿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537$ ,表示社会心态同青年生育意愿有显著的正相关,当社会心态每增加一个单位,则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会增加 $53.7\%$ 。可见,社会心态积极的青年,往往对未来更有信心,预期自己能有较好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也更愿意生育孩子,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能

力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相反,当社会心态消极时,青年往往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对经济压力和生活不确定性的忧虑会使他们生育意愿下降。社交媒体上关于内卷化育儿的讨论,以及育儿过程中的高消费展示也加剧了青年的消极心态。许多青年通过社交平台看到他人展示他们理想化的育儿生活,比如自由的陪伴时间、高昂的教育花费和昂贵的育儿设施,这些内容往往进一步加剧他们的焦虑感和对生育的抵触情绪。持消极心态的青年群体,由于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可能产生心理防御,会更倾向于选择通过推迟或放弃生育来规避未来可能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因此,推动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加强对青年群体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对于提高青年的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

## (二)政策启示

近年来,低生育率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日益低迷,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人口问题。为了有效提升青年的生育意愿,必须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并从多个方面给予支持。基于此,本研究结合社会比较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构建了一个探讨社会比较对青年生育意愿影响机制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在社会比较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链式传导作用。在当今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背景下,青年们常常接触到他人的生活展示,这种信息的流动不仅影响他们的心理预期,也让他们更容易产生社会比较。高消费的月子中心和昂贵的育儿支出等信息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出现,使得普通青年在与他人的生活进行比较时,容易对自身的现状产生失落,进而感到相对剥夺。相对剥夺感的上升直接影响社会心态,导致青年在面对生育问题时变得消极。社会心态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心态的消极化使得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进一步下降。因此,提振青年生育意愿要从心理和制度层面双管齐下,解决相对剥夺感和社会心态的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提出以下四点政策启示。

第一,优化社交媒体内容治理机制。社交媒体在青年社会比较过程中作用显著,其算法推荐机制偏好推送高消费育儿、奢华生活方式等“精英叙事”,这使得青年在进行社会比较时容易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这种剥夺感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心态,还进一步降低其生育意愿。针对政策实施中潜在的技术实现难度、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挑战,以及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能导致政策适用性与效果参差不齐等问题,建议采取以下协同治理路径。首先,推动算法推荐机制的优化与责任化,而非简单的内容限制。应联合相关部门、平台及社会力量,制定并细化针对过度渲染物质消费、制造育儿与生活焦虑的内容审核指引,为平台提供明确的操作依据。在此基础上,引导并支持平台优化算法模型,降低“物质化”内容的权重,增加多元价值表达,确保用户能够接触到展现不同地域、阶层、职业背景的真实、多样的生活样本,例如普通家庭的温馨育儿互动、简约生活带来的满足感、多元职业路径的成就感等。其次,为增强政策可操作性与稳健性,可考虑优先在头部平台或特定代表性区域开展试点,同步探索建立基于平台社会责任的评价与激励机制,如将内容生态多样性积极社会心态影响纳入关键评价指标,并对表现突出的平台给予适当政策支持,以激励平台在商业模式调整中兼顾公共利益。平台应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在信息流显著位置设置标准化提示,如“内容仅为生活片段”“幸福定义多元”,帮助用户理解社交媒体内容的选择性与展示偏差。再次,为有效应对区域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政策执行挑战,方案设计需高度关注区域适配性,鼓励平台根据用户地域特征开发差异化的内容池与推荐策略。此外,提升青年媒介素养是治理体系的关键一环,应将社交媒体信息甄别、批判性思维培养及理性社会比较认知等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社区教育和线上公益项目中,帮助青年理解平台运作逻辑、识别社交媒体中“完美人设”的建构性,并认识生活本身的复杂性与个体差异性。最后,需构建动态的政策评估与多方反馈机制,通过持续的用户调研、舆情分析及生育意愿相关研究监测实施效果,并根据反馈及时优化调整策略。该综合治理框架旨在系统性拓宽青年对幸福与成功定义的认识维度,弱化对单一物质生活叙事的过度依赖,引导青年建立基于自身价值观和现实条件的生活目标,从而营造更包容、真实的社交媒体环境,有效缓解相对剥夺感与焦虑情绪,为提升生育意愿培育积极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二,打造职场公平与家庭友好的制度环境。相对剥夺感的产生往往与个体在生活中感知到的不公平现象密切相关。在生育问题上,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可能会面临职场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导致她们在社会比较中产生更强烈的剥夺感。此外,男性也在面临生育问题时感受到经济压力,许多男性担心自己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生活,无法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这些使得男女双方在生育意愿上都显得犹豫不决。为了提升青年生育意愿,应当加强职场性别平等政策保障,推行生育友好型企业建设,落实男女同工同酬、延长男性陪产假、设立弹性工作制等措施。这不仅可以减轻女性因生育而面临的职业风险,还能提高男性对于生育的信心,从而共同推动生育意愿的提升。与此同时,许多青年因工作压力而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因此保障合理的工作时间和双休制度至关重要。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确保其按照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长运营,避免员工完全陷入工作和生活边界不清的失衡状态。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和经济压力,消除青年在生育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第三,构建多元养育支持网络,弱化代际支持依赖。在当今社会,许多青年在育儿问题上认为家庭支持和代际帮助至关重要,但这种强代际依赖性容易加剧社会比较及相对剥夺感。对于很多双职工青年家庭来说,即便已经生育了孩子,忙碌的生活节奏使他们很难抽出时间来照顾孩子。如果其中一方辞职,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会显著增加,因此依赖代际育儿支持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并非所有家庭都能提供青年所需的育儿支持。一些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可以为年轻父母提供经济和时间上的帮助,比如请月嫂、定月子中心或是由祖辈协助照料。与之相对的是,许多年轻父母的父辈可能还在为生计劳作,或健康状况堪忧,无法承担额外的为子女育儿的责任。由于缺乏有效的生育支持系统,许多普通青年面临着很大的生育压力,这使得他们在考虑生育时产生消极态度,生育意愿下降。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公共政策应着力推动公共托育服务的普惠化,建立社区共享育儿中心,以提供低成本的临时托育服务。这一举措不仅能够减轻家庭对代际支持的依赖,还

可以降低因代际支持不平衡带来的社会比较和相对剥夺感。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养育支持网络,青年群体将能够享受到更多的选择和支持,从而减轻育儿过程中的压力。这将有助于改变当前的社会心态,提升青年对生育的信心,最终促进其生育意愿的提升。

第四,对生育价值进行社会化重构。人们关于生育价值的认知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社会比较对个体生育观念的塑造。在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上,关于“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论调、对结婚和育儿的负面刻板印象,特别是对婚姻中性别角色的扭曲以及对育儿责任的偏见,都容易让青年产生对婚姻和生育的错误认知。这些认知不仅在短期内影响着个体的情感态度,也可能长期塑造个体的生育意愿,导致青年群体形成对生育的消极态度。例如,“女性已经不想像自己的母亲一样生活,而男性还想和他们的父亲一样生活”,认为婚育意味着女性的牺牲,以及“女的都不想结婚了,男的还在意几万块彩礼”“结了婚,男的打女的叫家暴,不管打多重都不会被重判”等言论,都存在对法律、婚姻和性别角色的过度简化和曲解。这些观点往往误导青年将结婚和生育与负担、牺牲甚至暴力等负面因素直接挂钩,进一步加剧对结婚和生育的恐惧与排斥。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上还存在许多“没钱生什么孩子”“真的把我养得很差”等言论,这一现象反映了社会对育儿质量和父母责任的高期望以及对父母教育能力的偏低评价,引发下一代对亲子关系的反思。这些极端、错误观点往往源于人们缺乏正确的生育教育和家庭价值观。因此,要改变这一现象,除了家庭教育以外,公共政策应通过教育体系的引导,帮助青少年树立理性生育的观念,如在教育体系中引入人生观、恋爱观、婚育观培育课程,帮助青少年从理性层面正确认识婚姻、育儿与个体发展的关系,形成正确的生育价值观。

## [ 参 考 文 献 ]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 [2] 《第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https://www.cnnic.net.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 [3] 刘娟 宋亭亭:《“被渲染的焦虑”:社交媒体使用与女性生育风险感知》,载《传媒观察》,2022年第6期。
- [4] 蒲艳萍 张岚欣 袁柏惠:《互联网使用与女性生育意愿——兼论中国女性生育意愿的结构性降低》,载《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3年第3期。
- [5] 廖丽:《生育信息“茧房”——网络媒介影响生育动机实证分析》,载《当代传播》,2023年第4期。
- [6] 张良驯 赵丹丹:《青年对网络生育信息的追随行为研究》,载《青年探索》,2024年第3期。
- [7]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1954, (2).
- [8] Wang, J. L., Wang, H. Z., Gaskin J., et al..The Mediating Roles of Upward Social Comparison and Self - esteem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Comparison or Ientation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Networking Site Usage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7, (8).
- [9] Smith, H.J., Pettigrew, T.F., Pippin, G. M., et al.. Relative Deprivation: A Theoretical and Meta - analytic Review,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12, (3).

- [10] Gurr, T.R.. Why Men Rebe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46.
- [11] Runciman, W. G..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A Study of Attitudes to Social Inequality in Twentieth - Century Englan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10.
- [12] 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载《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 [13]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 [14] 徐天琪 叶振东:《浙江省城乡人口生育意愿差异分析》,载《南方人口》,1994年第2期。
- [15] 席薇 张丽辉 于涛 王莹:《天津市初婚夫妇生育意愿分析》,载《中国公共卫生》,2000年第5期。
- [16] 谭克俭:《我国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转变分析》,载《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 [17] 杨瑛 武俊青 陶建国 高尔生:《已婚流动妇女的婚姻及生育状况分析》,载《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2年第11期。
- [18] 赵景辉:《中国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对哈尔滨市已婚在业人口的调查》,载《人口研究》,1997年第3期。
- [19] 任远:《生育水平的影响机制和低生育率社会的生育服务支持》,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 [20]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96页。
- [22] Gibbons, F.X., Buunk, B.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Comparison: Development of a Scale of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1).
- [23] 马皑:《相对剥夺感与社会适应方式: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载《心理学报》,2012年第3期。
- [24] Brasini, M., Tanzilli, A., Pistella, J., et al.. The Social Mentalities Scale: A New Measure for Assessing the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Underly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20, (4).
- [25] 周国红 何雨璐 杨均中:《“生育主力”缘何有名无实?——基于743份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分析》,载《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 [26] 张良驯 赵丹丹 范策:《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青年生育意愿缺失研究》,载《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9期。
- [27] 张殿元 张良悦:《相对剥夺感:社交媒体使用对社会心态的影响研究》,载《未来传播》,2024年第5期。
- [28] 吴金花:《群际接触:青年网民“群体极化”现象的理解框架与主动因应》,载《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8期。

(责任编辑:崔伟)